

上海文学地图之历史变迁

王纪人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文章主要勾勒上海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之间的历史的、动态的关系, 并以此检讨上海目前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 上海; 区域文化; 区域文学; 文学创作

此题目主要为了勾勒上海区域文化与区域文学之间的历史的、动态的关系, 并以此检讨上海目前的文学创作。

众所周知,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中国文化南移, 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曾经出现过一个高峰期, 其余脉一直持续到40年代。那是一次文学地质层的造山运动, 移来或就地崛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或最奇特的一些峰峦: 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沈从文、叶圣陶、林语堂、梁实秋、丁玲、艾青、丰子恺、夏衍、田汉、胡风、施蛰存、张爱玲、钱锺书、王辛笛等。有的作家虽然后来如大雁离去, 但雁过留声, 他们在上海创作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钱锺书的《围城》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 几乎都集中在海拔几乎为零的小小的上海版图上, 仿佛要通过长江的出海口把中国的文学推向世界。这真是世界文学地理学上的奇观。究其原因,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等方面最发达也最开放的城市, 尽管充满着半殖民地的污泥浊水, 也有政治压迫和精神危机, 但仍如强大的磁场一般, 吸引了周边城市和内

陆城乡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文学青年们, 其中有的则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 纷纷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里有结社和办刊的相对自由, 拥有国内最多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和报刊杂志, 文学家们基本上以社团和刊物为中心形成自己的流派, 并进行文学论争。当时并无“引进人才”之举, 正如梁实秋所说: “上海这个地方并不曾请我来, 是我自己愿意来。”(《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 所谓“文化南移”, 主要指的是从北平移到了上海。作为一个移民社会, 华洋杂处、中西荟萃, 不仅在物质和经济上成为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 素有“东方巴黎”之称, 更重要的是“文化移民”, 尤其是文学艺术人才都先后蜂拥而入, 或进进出出, 繁荣了这个城市的文化, 其中成就最辉煌的是小说、散文、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外国文学的翻译, 同时也繁荣了出版市场和其他文化产业。可以说, 上海当时的文学人才, 除极少数外, 几乎都来自于外省市。从谱系学上说, 他们没有上海血统, 绝大多数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乡移民。对大多数人来说, 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是陌生的“他者”, 而非他们的身体自小触及和习惯了的出生领地。他们带着乡镇小城的经验烙印, 在“十

收稿日期: 2004-01-01

作者简介: 王纪人(1940-), 男, 上海市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中开始新的生活,在身份上,他们是自由撰稿人、大学教授、革命者,海归派,乃至流浪文人。身体和地域的冲撞,使有的人产生了严重的不适感,如沈从文,最终他选择定居北京,并成为“京派”的领袖,而对“海派”大肆鞭挞。而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作家则选择了上海,是上海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他们,使他们具备了世界的眼光,同时他们也助成了上海发达辉煌的现代文化。正是他们为上海的文学园地带来了乡野的气息、内地深宅大院里的喘息和抗争、生活无着而感情同样饥渴的女性的呼喊、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他们有的也描绘了上海市民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和半殖民地的恶之花。一般来说,他们一面享受着上海现代化的便利,一面又持批判的态度。林语堂把上海称作“伟大而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上海之歌》)胡风的批判倒是更理智些:“上海是一个海,但在污秽里面有不污秽的东西在潜伏,在腐烂里有健康的生命在生长。”(《上海是一个海》)。张爱玲也许是当时的上海作家中最认同这个城市的:“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到底是上海人》)启蒙主义的批判和呐喊显然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主旋律,但与此同时,具有海派色彩的左翼文学、都市文学和大众消费文学都明显地具有上海地域的特征。当时的上海文学基本上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保持了同步的态势,除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外,崛起不久的现代主义的世界潮流同样浸淫了上海的文学,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风气之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文学不再占据领先的地位,由于新中国定都北京,首都吸引和集中了大批文化人,在文学上同样执其牛耳。此时的上海文学地图基本上由三支队伍来绘就。一支是巴金、柯灵、王西彦等老作家;一支是来自延安或新四军的革命作家,如周而复、吴强和茹志鹃等;一支是以胡万春为代表的新兴的工人作家。由于当时的文艺政策继续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因此基本上以写工农兵为主,讴歌共产党、讴歌新中国、讴歌革命英雄主义

成为那个时期文学的主旋律,那是国家意识形态与严密的体制文化下的主旋律,这一点与当时中国文学的整体态势没有太大的不同。即使是以批判旧家族著称于世的巴金,此时也写了大量歌颂性的小说和散文,如《团圆》、《赞歌集》、《保卫和平的人们》、《大寨行》等,虽然满腔热情,却有点儿力不从心。周而复的多部曲《上海的早晨》是继茅盾《子夜》后写上海资本家的作品,塑造了众多资本家的形象,但他们不再是被买办资本家和官僚资产阶级挤压的值得同情的对象,而是被共产党改造的需要批判的对象。这部长篇的价值在于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学的区域特色。吴强则以革命历史题材《红日》名闻遐迩,同样以此为题材的茹志鹃,却从细微处着眼,以女性的笔触来抒写革命的人情。至于工人作家的作品,因塑造了现代文学史上绝少出现的工人阶级形象,也载入了当代文学的史册。总体来看,包括上海作家在内的所有中国作家,在这一时期由于受狭隘的文艺路线的支配,被要求为政治服务,以及不断被要求改造思想和受到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艺批判的压力,自然不可能自由地创造作品,因此即使是其中的“红色经典”,也不能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相提并论。在上海的文学地图上,不再有名山大川,只有一片高低起伏的丘陵与沼泽地。但与除北京以外的区域文学相比较,仍然可以称之为发达的地区。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上海文学地图。如果说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基本上由复出的老作家、曾被打成右派的中年作家和知青作家组成,那么在上海,除较晚从武汉到上海的白桦等外,第二类作家甚少,在相当程度上使上海文学缺乏整体的反思色彩。但巴金作为老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却担当了此一重任,他在这一阶段最大的贡献不是纯文学意义上的,而是《随想录》等散文对文革的反思和自我忏悔:“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的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没有神》)整个《随想录》都充满

着这种对由人变兽的忏悔,和对被鞭打而为兽的抗议,以及对文革十年这种噩梦与“神”的“梦话”的厌恶和唾弃。这种深刻的反思和忏悔,达到很大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却是这一时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都未曾达到的,在上海当时青年一代作家的作品中也较匮乏。康德在谈到启蒙时曾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 aude! (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历史理性评判文集》)作为“五四”一代的老作家,巴金在经历把人变成兽、神剥夺人的理智,使中国人不再能自己思考的浩劫后,痛定思痛,真正发扬了五四启蒙的精神,可以说,他是新时期文学新启蒙的最杰出的代表。正如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给巴金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时所说的,“您就是中国形象本身,一个经过若干世纪的考验所锤炼的,并且不断从自身中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的形象本身。”

近二十多年来上海地区创作精力最旺盛、产量最高的是“知青”出身或比他们资历较早的一批作家。他们受全国性的反思和创新的文学潮流的影响,同样经历了“伤痕”、“反思”、“寻根”等阶段,在艺术上逐渐形成写实和先锋等多元的格局,如余秋雨、王安忆、王小鹰、叶辛、赵长天、陈村、竹林、孙颙、赵丽宏、陆星儿、宗福先、俞天白、程乃珊、蒋丽萍、殷慧芬、陈丹燕、唐颖、沈善增、王晓玉、王周生、潘向黎,还有已故的戴厚英、李肇正等,孙甘露、格非则属于先锋派,且有全国影响。其中,王安忆在题材、叙述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如《叔叔的故事》等,当两者构成一种张力时,往往取得双赢的效果,从而使她超越了较单纯的写实和形式实验的局限,而引人瞩目。在城市与文学、城市与人物的关系上,俞天白采取更直接紧密和宏大叙事却类似报告文学的方式,如他的大上海系列。更多的作家在叙述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历史或现实时,从一个具体的阶层个体、里弄、单位切入,注重具象和细节,显得更具文学性,但往往被指责不够大气或未能直接反映城市变革的大现实。前者涉及创作格局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敏感性或文学功能的问题,多数上海作家不愿意作配合形势的宣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外,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人心的作品,艺术上的创新也相对薄弱,作家的人数不少,但整体水平不如北京、南京、武汉、西安等地。施蛰存生前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不如三十年代。当代作家对文学的认识比较肤浅,用一点小聪明,只看到表面,看不到社会现实深处,中国文学最好还是三十年代。”(《施蛰存:中国现代文学的见证人与参与者》)此话是就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历史阶段而言的,就上海地区的文学而言,这样的比较同样能够成立,而且更加确切,尤其是对某些新生代的作家作品来说。如卫慧的小说,把大量的时尚元素——酒吧、派对、隐私、性色、颓废等另类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引进作品,使文学成为展示和炫耀官能消费主义的娱乐场所,尽管颇有轰动效应,也不无亚文化研究的价值,但其肤浅流俗则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上海文学地貌的趋向于低地化,评论界也有不少议论,有的从作家主观方面寻找原因,有的则从地方意识形态方面寻找原因。在此我试图从谱系学的角度略作分析。目前上海文学创作的主力军是已经年过半百的“知青作家”以及三十上下的新生代作家。“知青作家”都是上海籍人士,尽管有的父辈来自外乡,但到他们这一代已经有了上海“血统”。虽然他们在文革中因上山下乡(有的则留在上海工厂或农场)少小离家,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城乡的差别、大城与小城的差别在他们的身体的感性实践中构成了两种文化、两种生存方式的激烈冲突。当他们年复一年在外乡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身处低水平的生活境遇时,会留恋大城市的相对繁华和家庭的温暖,千方百计地想返回上海。在外乡人的眼里他们始终是“上海人”：“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了。”而当他们遇赦似地返城后,却也会产生对乡村的依恋和在城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失落,这种文化的冲突和在城乡两面都找不到位置的身体体验与切身感受,既是他们的真实的存在,也是他们进入文坛时的最初的表达。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正是她那一代作家身体体验的最确切的描写,小说中写到陈信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浑身不自在,因为他横着身子,碰到了别人,而被斥为“外地人”,后来弟弟教他要侧着身体站,才找到了“安定的位置”,“站稳脚了”。看

似一个细节描写,却活脱脱地写出了在上海这个城市曾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上海人的身体的存在方式和生存体验。整整一代上海知青作家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功成名就,可以说,他们真正地在上海文坛“站稳脚了”,其中有相当的数量还被任命为文化官员,成为文化政策的制订者或执行人。但是上海人在狭窄的生存环境中养成的一套生存技巧或身体体验,已潜移默化地指向了他们整体的生命活动。即使公交车已不那么拥挤,住房条件也大大改善了,道路也拓宽了,上海人变得更优雅潇洒了,但他们的感知结构、感知图式和生存观念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们多半循规蹈矩而缺乏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缺少越轨的举动。这不只是上海人的性格,也是上海的意识形态,它造就了上海的稳定,也造就了上海文化体制和艺术规范的保守。即使哪个作家敢于改变一下自身根深蒂固的上海人性格,不再侧着身子站,在艺术创作上越雷池一步,但在强大而保守的文化体制下,也不大可能真正前进半步。这一代上海作家的身体谱系,他们的上海血统和出身,以及他们的身体所处的文化体制,决定了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不可能在这块版图上崛起真正的文学高峰。但谁能真正预测上海文学的未来呢?正如福柯所说:“历史力量以某种方式作用于人的身体,并且也通过人的身体而发生作用,但这种方式却不能从一种总体的历史规律中来加以解释。”^{[1](P95)}

上海作家其实很勤奋,每年都推出新的作品,数量可观,总体质量也是在平均线以上的。有的作品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写得是蛮好看,也蛮扎实的。如果罗列出来,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清

单,但人们总是感觉到不如有些外省市的一些作家动静那么大,成就那么大。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本土作家大多不会自己炒作自己,他们比较矜持,有点洁身自好,就像住在老公寓里的绅士淑女一样,一生都是安安静静的,不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或者可以比作夹弄里的名厨,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所以他们不好意思勾结评论家为自己叫卖,市场意识是比较缺乏的。上海本土作家比较注重游戏规则,没有匪气,不大会做出格的事,这当然有利于安定团结,但其实为人需谨慎,为文且需放荡。因为循规蹈矩惯了,创作上也形成了驾轻就熟的习惯模式,不想再伤筋动骨瞎折腾了,这几年艺术上的创新、题材的拓宽、意识的前卫,就相对少了些,而前几年还有点,如陈村的《鲜花和》。其实这种状况也与上海血统作家的身体体验、感知图式和生命指向大有关系。上海当前的文学创作缺少更厚重和震撼力的作品,这始终是大家的一块心病。但我相信,随着上海城市的进一步开放,作家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变得更大气、汪洋恣肆一些,甚至脱胎换骨一番也是可能的。移民作家的进入,也会改变作家群体的固有结构。回想一下上个世纪30年代,那么多移民作家从乡土、小城涌入,或海归,不仅使上海的文学地图大为改观,也利用上海的文化优势使自己上升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上的巨星。如果想赶上30年代的红火,还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上海要重新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中心。

参考文献:

- [1] 路易·麦克尼·福柯[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Literary Writing Status in Shanghai

WANG Jir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intended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regional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lso, the paper reviews the literary creation in Shanghai at the present time.

Key words: Shanghai, regional culture, regional literature, literary creation

(责任编辑:吴晓明)